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国际政治

中美“和” 天下“宁”

□ 王 鹏

9月22日，习近平主席正式访美。这次峰会对于中美这两个关系日趋紧张而微妙的世界性大国而言，其意义非同寻常。人们期望这次历史性会晤能够为太平洋两岸的民众带来长久“太平”。那么，此次访问为何如此重要？中美关系又为何如此受世人关注？它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有何影响？

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东亚转移的大趋势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有关世界中心转移的话题更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探讨。世界中心在21世纪将向何处转移？此次转移是否会带来国际政治的体系变化？如果是，那么中国又当如何利用此次世界中心转移的历史趋势？

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提出了一个衡量世界中心的转移与否的标准：第一，该地区必须存在世界级大国——存在若干国家具备世界级的物质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模仿的样板；第二，该地区还必须也是国际矛盾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心国家在本地区及其他地区进行争夺。

按这一标准历史地来看，我们就不难发现，欧洲从19世纪到20世纪末都是毫无争议的世界中心。在二战前，欧洲列强及其矛盾与争夺都集中在欧洲；二战后，虽然世界权力由欧洲向其东西两翼转移到莫斯科与华盛顿，但东西方的对峙亦然沿着横亘于欧洲大陆之上的“铁幕”展开——集中这个星球上最强武力的两大军事集团在此排兵布阵、剑拔弩张。

然而，时过境迁。当前，决定世界中心是否转移及其转移方向的关键因素，不是美国实力的增减，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与欧洲相对实力地位的变化。具体来说，自2008年危机以来，欧洲和美国都在一定程度地衰落。但欧洲和美国衰落的性质并不相同，因此其对世界中心转移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就美国而言，其衰落尚未从根本上动摇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意味着，作为世界上仍然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美国依旧保持着与东亚相当的世界级影响，所以它仍然是未来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与之相比，包括俄罗斯在内整个欧洲的衰落则将彻底改变世界力量分布的版图。照此趋势，当欧洲的全球影响力小于东亚且无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具有成为世界级超级大国的潜力时，欧洲和东亚实力对比的反转就会推动世界中心由欧洲向东亚转移。

中美在亚太竞争日趋激烈

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经济体，但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还相差甚远，在政治—安全实力上也不如美国，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中国的盟友数量仅仅是美国全球军事联盟体系的一个零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放弃了输出革命，也不再争当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而是专注于发展经济，所以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因而当下在世界中心转移的过程中与美国的首要竞争领域也是在经济展现——两国贸易摩擦不断，汇率、准入等矛盾突出。随着形势发展，中美在地区安全的竞争也开始加剧。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美所在的东亚—太平洋地区不仅是当下及未来中短期内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凭借比其他地区更蓬勃的经济），同时也是政治—安全斗争的危急地带（譬如相对欧洲高度发达的安全共同体）。因此，处理好中美关系，不仅关乎两国国运，更是为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基础。

协调中美跨太平洋关系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基础

然而“遗憾”的是，相比中方舆论的期盼中美合作的态度，美方舆论并不一致。不仅美国社会舆论中不乏批评和指责中国的声音，美国政府在态度上也刻意压低调门，甚至刻意强调两国在网络安全、南海争端、市场开放、人权问题等领域的分歧。

尽管有以上种种不利因素，但我们也同样应该看到，近年来两国仍然在诸多领域达成了共识，甚至开展了合作，譬如2014年11月达成的减排协议、2015年4—7月两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默契。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亦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如此。中美两国，虽远隔重洋，但在科技发达、网络便捷的今天，凭着每年近6000亿美元的贸易额，凭着数百万人的航空往来、数十万人次的留学生互派互访，两国又何尝不是“鸡犬之声相闻”。北京与华盛顿犹如矗立在大洋两岸的两个巨人，不仅担负着本国民众的福祉，更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只有实现中美和平、合作、和谐共赢，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持久的幸福与安宁。

“后李光耀时代”首次大选：新加坡找到自信

□ 张学刚

新加坡“后李光耀时代”首次大选尘埃落定，由李光耀一手创办的人民行动党一扫上届大选得票率仅60.1%的阴霾，一举拿下国会89个议席中的83席，总得票率达69.9%，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然而，选前不少舆论对人民行动党能否轻松赢得大选并无十足把握。但选举结果表明，与反对党漂亮的口号、激烈的言辞和热闹的竞选造势场面相比，人民行动党扎实务实的施政业绩、坦诚亲民的工作作风依然在新加坡多数民众中拥有亲和力。考虑到其较高的支持率是在多党公开选举的机制下取得，其“含金量”无疑是较高的。

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获胜，一个重要原因是始终坚持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新加坡政府一向以务实高效著称。面对选民对民生问题日益增多的诉求，政府近年来可谓全力以赴，相继推出“建国一代”福利、“终身健保”津贴、“SG50”个人所得税打五折、将最低工资提升至3300新元等多种惠民措施。在公共交通方面，政府更多地承担起了本应是运营商开展的工作，如2013年出资11亿新元购买巴士，增加巴士班次，缓解交通问题。面对民众普遍关心的住房问题，政府除加紧建设组屋（廉租房）外，近年来还力促房地产市场降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住房焦虑。移民问题是当前新加坡民众不满较多的领域。新加坡长期缺乏劳动力，导致发展后劲不足，因此政府自90年代末以来积极引入外来移民，对缓解新加坡用工荒和带动经济发展发挥作用。但凡事有利必有弊，由于引入移民较多，也带来交通拥挤、公共设施不堪重负、工作竞争压力增大、本地人心理不平衡等问题。对此，人民行动党近年来积极做出调整，适度收紧了引进外来劳工政策，适度降低引进外劳的数量配额，提高了公民与非公民的待遇差别，要求公司优先招聘本地人，并相应增加了非公民的购房税。人民行动党也劝说本地人应更加勤奋地工作，以开放的胸襟接纳外来高素质移民，得到大多数民众理解。

人民行动党获胜的另一个原因是坚持以真诚的态度与民沟通、展现诚意。2011年大选是执政党史上得票率最低的一次，民众反映较多的是政府倾听民众声音不够。近年来，政府抓紧转变作风，很多政府机关都增设了专门负责处理民众投诉、经营与民众关系的部门，政府在决策时更加注意听取民意，如采纳环保组织意见，搁置了一些大型基建项目。政府还设立了“新加坡谈话”（SG Conversation）等电视对话节目，尝试让草根组织更多地对政府施政提出建议。此外，政府更加强调以柔和、亲民的手法开展公关宣传，避免生硬地说教，如对地铁进行维修期间有意在灯箱海报上打出维修人员的姓名、联系方式并说明“我们正在加紧维修”，给民众以真诚负责的印象，更好地赢得了民众的理解。

人民行动党的获胜，还与其审时度势、善于导正国家发展方向密不可分。近年来，“街头政治”“颜色革命”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迅速传播，柬埔寨2013年大选后朝野发生激烈对抗，泰国街头示威导致军人再度控局，马来西亚近期多次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新加坡长期施行独特的“软威权”管理，遭到西方诟病。面对邻国刮起的政治风暴，新加坡能否顶住压力、站稳阵脚，外界和许多新加坡人都心存疑问。今年3月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去世，给彷徨中的新加坡人再添忧虑。但事实证明，人民行动党不愧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利用凭吊李光耀和纪念建国50周年系列活动的契机，人民行动党选择了“哀兵策略”，不失时机地与民众展开互动，共同回顾新加坡建设成就，再次成功地维护了国家团结，凝聚了民心士气。不少民众转而对政府的“苦口婆心”多了一份理解，对新加坡的未来多了一份呵护，对执政党的真诚多了一份信任，成为人民行动党获胜的关键。

人民行动党的获胜，也与其熟谙西方选举政治、合理利用竞选规则密不可分。作为沟通东西方的桥梁，新加坡长期以来必须在东方式问政与西方式管理间寻求平衡，用李光耀的话说，新加坡既要坚持多党选举的“名”，又要确保国家团结一心的“实”，殊为不易。严酷的现实迫使人民行动党在选举操作上拥有了超乎一般政党的智慧。例如，集选区制度就是人民行动党极富特色的创举。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要求本选区必须有4—6名候选人“捆绑”参选，“集体赢才算赢”，且至少须有1人为少数族裔。这一选举制度使人才济济的人民行动党占尽选举优势，而其并不违反西方选举原则。

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后李光耀时代”的首次大选，人民行动党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取得了“开门红”。然而，人民行动党并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实际上新加坡仍面临内外诸多挑战，政府仍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

一是如何在改善民生福利与保持国家竞争力方面保持平衡。近年来，受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增多、金融市场波动影响，新加坡经济发展时好时坏，传统优势流失，国际竞争压力增大，需进一步推动知识经济发展，推进地区和世界金融中心转型。新加坡政府既需解决好居民的住房、交通、医疗、养老等一系列问题，也需适度保持社会竞争压力，慎防患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病”。新加坡需继续引进外来高端人才和部分熟练工人以解决本地劳动力短缺、创新发展不足等问题，但过多引入外来移民又会导致有限的公共资源更趋紧张，甚至激化国内矛盾。

二是新加坡需积极应对国际和地区挑战，找准并发挥好自身在新一轮国际经济重组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东盟为数不多的发达经济体，新加坡需推动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整合“10+6”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合作，并不失时机地与中国“一带一路”及亚投行建设接轨。同时，作为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创始国之一，新加坡还需避免美国主导的机制过度撕裂东盟。未来三年，新加坡还将作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协调人发挥重要作用，需谨防南海问题过度发酵而冲击东盟自身及新加坡发展。

三是妥善应对政治多元化挑战，增强政府施政透明度。新加坡民众特别是年轻选民长期以来对政府“家长式管理”“母鸡看护式施政”存有不满。未来政府如何应对网络、新媒体对社会舆论多元化的挑战，以及满足年轻选民对政治透明度的诉求，压力日益增大。

四是着力培养下一代领导团队并打赢下届选战。本届选战虽说是“后李光耀时代”首次大选，但不可否认，“李光耀光环”对执政党获胜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五年后，当“李光耀光环”逐渐退去，当年近七旬的李显龙宣布卸任总理时（他曾多次表示2020年可能退休），人民行动党或将迎来真正的严峻考验。由此看来，本届大选虽波澜不惊，但或许意味着新加坡政党角逐的真正开始。未来五年无疑将成为新加坡建立稳定、民主和理性的政治制度，确保国家“成功闯关”的关键时期。李显龙和人民行动党肩上的责任并不轻松。

环球瞭望

美国政要眼中习近平的执政风格

□ 张仕荣

党的十八大以来，美国政要对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与执政理念的认识日益清晰且全面。

意志坚定

意志、勇气、担当，一些外国领导人在和习近平接触后都用这样的词汇描绘他，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美国政要对习近平坚定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推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富强的理想信念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4年11月11日，习近平与访华的奥巴马总统在中南海瀛台会晤中指出：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重视“大一统”。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国家是第一位的。历史多次证明，只要中国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国家就能够强盛、安宁、稳定，人民就会幸福安康。一旦国家混乱，就会陷入分裂。老百姓的灾难最惨重。我们对主权看得更重些，原因就在于中国历史上曾多次遭受外敌入侵。中国人民对国家主权和安全面临的外部威胁往往最为敏感。这是中国长期面临历史忧患所造成的。奥巴马一再表示理解中国人民为何珍惜国家统一和稳定。2014年12月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公开谈及自己的访华之旅，并赞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他“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独有偶，“强势和务实”也是美国副总统拜登对习近平的评价。拜登被认为是美国政府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过最多交流的官员，他曾与习近平一次会谈的时间长达四个半小时。在这位美国副总统看来，私人关系是国家领导人建立信任的重要工具。

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是一位华裔美籍外交官，他不仅称赞习近平“很有自信”，更认为习近平“对未来中国有清晰的愿景目标，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自豪、独立而强大的国家”，“中国现在几乎已建成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对此要向所有中国领导人表示敬意，包括习近平主席”。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多次评价中国领导人，他认为习近平聪明，思想敏锐，有责任感，有当领导的思维经验。

践行改革

习近平锐意改革的决心也让美国政要印象深刻。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在他与习近平的会谈中，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成果。拜登提到了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开放服务行业、由市场驱动的汇率等改革内容，认为这些都是很有雄心的目标。他同时表示，中国提议进行的改革也与美国的优先事项相匹配，比如保护知识产权、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在谈及中国进行的改革时，拜登表示，“这些都是受欢迎的举措，但也会是艰难的举措”，“最终，关键的还是执行工作”。拜登说他不怀疑中国领导人的承诺和决心，但“改革无论在哪里都是充满挑战的”。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说，习近平正在相当大程度上展示着“前所未有”（unprecedented）的领导力风格，以相当“单边的、进取的、自信的”方式领导。他在规模较小、想法更相似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促进和帮助下决策，并且借助一些务实的前省长，有意推动经济改革。洪博培称他对中国告别旧式手法，更多尝试迈向经济发展和法治的新手法感到乐观。他还预期，中国的反腐会从像周永康那样的退休高官转向在职官员，这对中国的体系来说是新的富有挑战性的阶段。

洪博培预期，习近平政府在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期间，也就是2017年到2022年期间将完成权力巩固，可能会看到他们以相当进取的方式进行更多的改革努力。

亲民和善

习近平亲民和善的形象一直在美国民众中深入人心。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认为在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关系有显著增进，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亮点。

斯考克罗夫特是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1年，他作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先遣团的一员来到中国，是最早访问中国的美国高级官员之一。1989年，在中美关系经历困难的时刻，他作为老布什总统特使两度访华，对中美关系的转圜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他见证了中美关系的起步和发展。他回忆说：“2012年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访问美国，我有幸见到了他。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很注重听取各方解决问题的意见。针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和双方如何合作创造一个更公正的世界，他发表过有说服力的演讲。美国人民很期待看到习近平主席的这一面。”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从普通百姓入手，走民众外交、公共外交路线，使美国普通民众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对维系中美关系的顺畅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眼看世界

时 评

安倍政权“暴走” 日本走向堪忧

□ 侯 隽

9月19日凌晨，自民党、公明党执政联盟主导的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强行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法案，正式升级为法律，使得日本坚守了70年的和平宪法名存实亡。“战争法案”下的日本国家走向不禁令人担忧。

日本社会整体右转

安倍政权如此一意孤行架空和平宪法，是多年以来日本社会整体向右转的一个缩影。在安倍等“修宪派”看来，和平宪法使得日本无力，而修宪就是“医病”的良方。从和平宪法确立的第一天起，右倾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就一直视其为眼中钉，修宪的心理冲动愈发强烈，安倍政权以修宪为其毕生的政治使命，誓言要“接棒”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安倍与战后日本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修宪派”是一脉相承的，其继承了该派的“衣钵”。安倍声称制定“自主宪法”是自民党的结党精神，是这一代日本人的使命。“修宪派”认为，和平宪法是外国占领军强加于日本的宪法，是“战后体制”的象征，如不能修宪或者废除和平宪法，日本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诸多限制，鸠山一郎、重光葵、岸信介、中曾根康弘等“修宪派”代表人物一直没能大展拳脚，但修宪进程却在逐步进展之中。2012年年底安倍二次执政，“修宪派”渐成气候，再次掌握日本政治主导权，利用逐渐抬头的民族主义情绪，频频炒作“中国威胁论”以骗取民意支持，并利用美国政策调整的机会，迎合其要求日本增加美日同盟防卫义务，配合美国亚太战略再调整战略，实现了修宪企图的实质性突破。接下来安倍将进一步谋求彻底修改和平宪法，废除和平宪法第九条当中关于军队和战争的最后限制，建立日本国防军。

“战争法案”下的日本未来走向堪忧

新安保法案的通过颠覆了战后日本奉行了70年之久的和平路线，预示着日本的国策将发生重大转变，必将给其自身与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

自毁形象，降低日本的国际信誉与影响力。二战后日本长期以和平国家示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也为其赢得了特殊的国际影响力，奉行和平路线、高度发达的经济同样奠定了其大国地位。也正是在和平国家的光环下，国际社会对于日本多年以来逐步谋求在军事上实现“松绑”，以及其对于侵略历史不思反省的错误观念展现了十足的宽容。然而，新安保法的通过使日本和平国家形象大打折扣，世人看到的是重新武装后具有进攻性非和平的日本，安倍一直所宣扬的“积极和平主义”外交也随之露出其真面目。

撕裂日本社会，国内纷争不断。安倍政权侥幸利用执政党在国会的占优势地位的有利条件强行使得安保法案通过，但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法案遭到了在野党和日本民众的激烈反对，日本国会上演了罕见的“全武行”，民众也发起了近几十年未有过的百万之众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新安保法对于日本社会的撕裂与伤害程度显而易见。社会各界的抗争将不会就此停止，未来一段时间日本社会可能陷入持续动荡的局面，对于不景气的日本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因新安保法带来的动荡，本已处于窘境中的“安倍经济学”面临着可能破产的风险，其政权也将丧失执政根基。

“战争法案”，“求安不得”。安倍宣称新安保法是为了缔造更加强大的日本，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但以“战争法案”来寻求安全无异于缘木求鱼。新安保法迎合美国战争需求将加剧日本的战争风险，日本扩充武力的行为也将加剧周边国家的不安，周边对于日本抱有警惕的中、俄、韩等国也将强化各自军备，加剧地区的安全困境。美国出于私利虽然同意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但不会对日本彻底“松绑”使其失去控制，而是始终对日本寻求真正独立的举动抱有警惕，日本所谓的“正常国家化”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只能是亦步亦趋与美国的战车越绑越紧。

破坏中日关系基础，恶化中国安全环境。可以说中国是新安保法最大的受害国。安倍为实现其“修宪梦”，在其重新执政后不惜以牺牲中日关系为代价，持续炒作“中国威胁论”，奉行对华敌视政策，其对于新安保法的指向并不隐讳，多次强调是为了应对中国、朝鲜等国的威胁。这种近似于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政策已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的基础。新法案的通过为日本追随美国重返亚太、谋求共同制约中国提供了法律保障，还将为安倍政权全面加强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菲越等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提供依据，将大大恶化中国的安全环境，加剧战争风险。